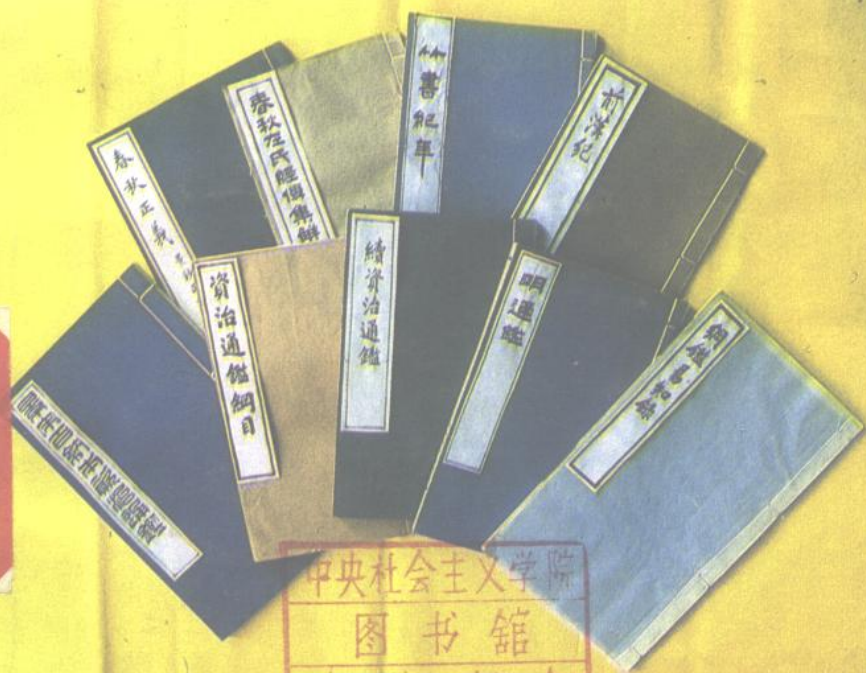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中国文化典籍 ·

中国古代的 编年体史书

陈秉才 高 德



68432



祖国丛书

· 中国文化典籍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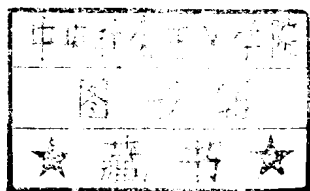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

陈秉才 高 德

人 民 出 版 社



200419369



封面设计：郭振华

· 中国文化典籍 ·

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

陈秉才 高德

ZHONGGUO GUDAI DE
BIANNIANTI SHISHU

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1987年6月第1版

5.5印张 103,000字
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36,700

书号11001·861

定价0.88元

目 次

给读者的话·····(1)

- 为什么要介绍编年体史书；什么是编年体；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；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与作用

一、编年体的萌芽·····(7)

- 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；编年体是怎样产生的；甲骨文、历法的作用；古代史官的职责

二、百国春秋与编年体的诞生 ·····(17)

- 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；初具编年体形态的《尚书》；孔子修《春秋》；《竹书纪年》的残存

三、突破性的改进·····(43)

- 《左传》的诞生；完善的叙事；史评方法的创立；思想性的重要突破

四、成熟与缓慢发展·····(65)

- 《春秋》的余波——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穀梁传》；《汉纪》的贡献

005263

五、黄金时代的代表作……………(76)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——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产生；司马光的生平；编纂《通鉴》的宗旨与方法；《通鉴》的史学贡献

六、“《通鉴》学”的兴起与

编年体的流变……………(106)

——“《通鉴》学”的起源；续《通鉴》的潮流；改编《通鉴》的两个流派；《通鉴》的功臣胡三省；王夫之等人对《通鉴》的评论

七、实录的产生及存亡……………(136)

——实录的起源；起居注的价值；起居注与实录的异同；历代实录的存亡；实录的真伪；结尾的话

附录一：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简表

……………(159)

附录二：“《通鉴》学”著作简介

……………(167)

后记……………(172)

给读者的话

——为什么要介绍编年体史书；什么是编年体；
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；编年体史书的
地位与作用

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面对数不胜数的典籍，总不免望洋兴叹，不知从何读起，这一矛盾今天亦然存在。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。我们之所以按照体裁系统介绍史籍，有二点考虑。首先，体裁最能反映中国史籍系列化特点，抓住一种体裁，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掌握一系列的史籍，收到提纲挈领、纲举目张的效果。从体裁入门，按类探索历史文献的特点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中国古代有个叫郑樵的史学家曾说过，学者最要紧的治学方法是“贵在知类”，“由流而溯源”，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概括为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。意思就是说治学必须首先弄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类属，辨明各个学术流派的界限，以及每一个学术派别产生发展的源流，这是治学基本途径。今天我们要学习、研究中国历史及各断代史、专门史，都应以熟悉历史书籍的类型为基础。如果对历史文献的类型盲

然无知，就根本无法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；如果熟悉了各类型体裁，就可以顺利查找所需资料。查系统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、文化史资料，可读纪传体、政书、类书等史书，查某一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，可读编年体史书，如此等等，都需要借助对史籍体裁有了如指掌的认识。可见，掌握体裁，乃是读史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。

其次，介绍史籍体裁，有助于发掘历史遗产，利用旧体裁、改造旧体裁，促进现代论著向多样化方向发展。编年体是中国第一种史书体裁，到近现代以后，编年体史书已经不甚发展了。但是，还能不能用古老的编年体史书体裁，来编写近现代历史呢？这需要对古代编年体进行分析，总结其利弊，摸索出利用旧体裁编写新历史的途径，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。

编年体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的编纂方式，用晋朝经学家杜预的话来说，就是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年，以便记远近、别异同。这是古代对编年体的最早解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记事首先标明年代，年之下记月份，月份之下注明日期，日期之下记述史实，这样就可以区分史实的先后顺序和彼此的异同。这种解释，就形式而言，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它还没有揭示出编年体体裁产生发展的规律，还不能使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编年体史书的特点。以后的史学评论家们，如唐朝的刘知几、清朝的章学诚以及近代的梁启超等人，都对编年体史书进行过一定研究和评说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他们都没有能够对编年体

裁做出历史的总结。今天，随着历史科学的长足进步，史学史这门新的分支学科的建立，以及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，系统认识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，也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。为了帮助广大史学爱好者熟习我国古代文化遗产，有选择地阅读编年体史书，有必要就编年体史书产生、发展的历史做一简要介绍。

在介绍正文之前，这里还需说明一下编年体史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，以便大家从总体上认识编年体体裁。

中国和世界史学的历史表明，按年月日记事，是人类最早用以编写历史的方法，可以说，编年体是古代史籍之源。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，其中就有大量按年月日记事的例证，中国现存最早的史籍《春秋》，就是编年体史书。在希腊，被称为“史学之父”的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30年所著《历史》（又名《希·波战争史》），记述希腊与波斯战争，用的是编年记事法；公元前411年修昔底德写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也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；在英格兰，被称为英国史学奠基人比德所著《英国教会史》、出于众手的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》，也都是按年记事；在德意志，最早的史书是兰伯特的《编年史》和艾克哈德的《世界编年史》；在俄国，最早的史书是奈斯托尔的《编年史》等。诸如此类，都说明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，最初的历史书籍一般都是采用编年体编撰的，几乎没有例外。这说明史学始于编年体，也表明编年体在中国和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。其中，中国编年体产生的时间，又居世

界首位。孔子修《春秋》约在公元前481年，比希腊“史学之父”的编年史还早五十多年。就是春秋、战国间成书的《左传》，也在公元前430年之前。可以说，中国是最早创立编年体的国家。

中国古代编年体在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，有二点应特别指出，一是在编纂法上的开创性，二是对后世各种体裁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。开创性使它成为古代第一大史籍体裁，成为古代史籍产生的标志，成为中国史学之源。对后世体裁的影响，是指编纂方法上编年体对各种体裁的基础作用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各种体裁都从不同角度采用编年记事方法，使编年体成了各种体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中国古代史籍有许多特点，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多样性和连续性，而这两个特点又与编年体的发展、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所谓多样性，是指体裁类型多。中国古代史籍体裁除编年体之外，还有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、政书体、类书体、史评体、史考体、方志体、传记体、文献汇编体等等。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各种体裁之间的区别和特性。但是，多样性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共性。这个共性就是指编年体存在于各种体裁之中。换言之，就是各种体裁包含着编年记事方法。如纪传体中，本纪、世家、年表、书志等体例，大体是采用编年记事法的。又如纪事本末体，虽然是以事为纲，但是，每一标目之下，分别按时间顺序记事。其他如典志体、传记体、方志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编年记

事方法。可见，编年体已经渗透到多种体裁之中，并且成了古代史籍编纂方法的基础。

所谓连续性，就是指一种体裁的诞生，后人往往都连续仿作、续作，形成按朝代相继，或者按体裁仿作的一系列历史典籍，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之后，有《汉纪》、《后汉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明通鉴》；《史记》之后有二十五史；《通典》之后有十通；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之后，有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、《元史纪事本末》等二十余种纪事本末体相继产生。这样，中国古代的史籍便形成连续性、系列化特点。这种连续性的形成与推进，又与编年体的演变密切相关。如《史记》，在编写方法上对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又是在编年体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。这些说明编年体和其他体裁的典籍都具有连续性发展、演变的特点。而且，编年体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体裁的产生和发展。

编年体史籍和其他史籍一样，具有“资鉴”和“风教”作用。纪传体以其记帝王将相为特点，被钦定为“正史”，它的“垂训”作用自不待言。编年体虽未取得“正史”之名义，但它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地位和“正史”具有异曲同工之效。清代官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得很清楚：“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，荀悦改纪传为编年。刘知几深通史法，而《史通》分叙《六家》，统归二体，则编年、纪传均正史也。其不列正史者，以班马（指班固、司马迁）旧裁，历年继作，编年一体，则或有或无，不能使时代相续，故姑置焉，无他义也。

今而仍搜罗遗帙，次于正史，俾得相辅而行。”^①把编年体视为正史，不始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刘知几早就在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中，把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看做古代正史了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在正史类目之下，也收录编年体史籍。这说明纪传、编年二体在内容上均具正史性质。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由皇帝敕撰、命名一事，也充分证明编年史也具有御用性质。这一点是应充分认识的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介绍编年体史籍，揭示其特点和产生发展的过程，不仅可以使读者加深认识古代史学的起源和特色，还可以帮助各类型史学爱好者选择阅读目标、搜集历史资料，提高学习、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，激发为振兴中华而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情。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·编年类序》卷四十七。《史通》：唐刘知几撰，二十卷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，全面论述唐以前史书的优劣得失，提出了史学家的任务和要求，强调史家应加强才、学、识的修养，被誉为史官之座右铭。《六家》：《史通》篇名。指尚书家、春秋家、左传家、国语家、史记家、汉书家。

一、编年体的萌芽

——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；编年体是怎样产生的；甲骨文、历法的作用；古代史官的职责

人类编年记事方法源远流长，但是，不能把所有标有年月日的记事文献都视为编年体历史书籍。编年体史籍在编纂学上是有严格标准的，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。在编年体正式产生以前，确实存在大量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历史资料，这些无疑是编年体产生的条件，但是，由于它们未经选择加工，也没有按一定程序编排组织，还不是完备的编年体史籍体裁，只能说是具备了编年体的某些因素，充其量也不过是萌芽状态的编年体原始文献而已。

完备的编年体必须具备五个条件，即文字、历法、史官记录的标有年月日的文献、编撰宗旨、对文献的抉择取舍和编排格式。如果只具备其中的部分因素，就可以视为不成熟或不完善的编年体，即编年体的萌芽。这五个条件就是我们区分编年体萌芽和产生的主要分水岭。

中国编年体的萌芽时期大体上可以划在夏、商、周时期。这个时期产生了按年月日记事的历史文献，还没有出现完

备的编年体史籍。我们说它不完备，是因为它们只有五个条件中的两、三个条件，是初级形态的编年记事文献、编年体的雏形。因此，我们把这个时期看做是编年体的萌芽时期。

文字是一切书籍产生的先决条件，任何历史文献都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逐渐出现的，其中按年月日记事的文献又是较早出现的。在没有文字以前，人类依靠结绳记事、刻木记事等原始方法帮助记忆。但是，原始的方法不能记载复杂而长久的事件，更不能说明事件的原委，甚至还可能发生错误的记载、错误的解释。为适应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、阶级斗争的需要，文字应运而生了。人们凭借文字可以把事件的原因、经过、结果记录下来，并借助文字材料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交流活动，进行新的斗争，以便取得新的成果。这些文字记录，就是历史书籍产生的基本条件。

文字是劳动的结果，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产物。统治阶级需要用文字记录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活动，进行行政管理，向臣民表达自己的意志，因此，最早的文字材料总是和国家的产生相联系，中国现存最早文字甲骨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
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文字，文字结构已达到相当成熟地步，可以断定它决不是原始文字。在此以前，商朝初期、夏朝中晚期，应当是文字的产生时期，可是，迄今尚未有所发现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夏朝是存在文字史料的。孔子曾说，“夏礼吾能言之”。“夏礼”可能就是用文字记载的国

(上缺)貞翌日酒獲日伯甲 一月。前七卷世三葉四片。

辛卯卜即貞王賓暨不雨 貞二宰 二月。後上廿七葉十二片。

(上缺)貞(缺)族暨宰教亡才在三月。明三六八片。

生于妣辛同暨其至(缺)祖 四月。前一卷廿六葉六片。

丙申卜行貞父丁日物在五月。後六葉七片。

癸亥卜大貞王賓□□日亡(文) 六月。明四三〇片。

乙酉出斗時^又七月。前七卷世八葉二片。
後八卷廿一葉祭名。

丙申卜貞事尊時羊世卯三宰。能一牛于宗用 八月。林二卷三
葉十一片。

甲寅卜旅貞翌乙卯□日卯三宰。□世八月在唐。明八四片。

乙卯卜行貞王賓后祖乙日宰亡才在九月。林一卷十二葉十五片。

家文献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》曾记载说：夏朝末期，桀荒淫无道，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，太史令（即史官）终古拿出国家法典文献，痛哭流涕的劝谏夏桀，希望他按国家法度治理国家。尽管夏桀未纳忠言，亡了国。但是，这说明夏朝已有史官，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国家文献。这时的文字及文献形态，因无可靠地下文物佐证，难述其详。

商代的甲骨文献，有了明显的进步，从文字结构到文献记事方法，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依据。但是，从史学领域看，甲骨文只是一些原始的历史文献，是没有用成熟的史学体裁编纂的官方文书档案，还没有形成完备形态的历史书籍。我们可以从甲骨文献中找出大量的按年月日方法记事的事例，能够看出原始形态的编年体文献，但是，还没有发现用一定理论和方法编撰成的史籍。大量的甲骨文含有记时、记事、记人等方面的内容，说明甲骨文献具备了史籍基本要素和编年体记事形态。读者可以从甲骨文记事图中看到，甲骨文献记事形式已经趋于系统化，说明当时记事已有一定程式，即日后记事，事尾署月份，而未署年。这种程式与后世的依年、月、日次序记事格式有很大区别。就此形式来看，也说明它尚不规范化。这种记事方法的原始性，是由于这些文献出自卜人（即史官）之手笔，是随时随事写刻而成，一事一记，不加整理，是最原始的官文书档案。图中反映的材料是编年性典册的例证。又据三十年代发掘的安阳第三十六坑甲骨遗址，经专家确认，坑内遗物为全年卜辞，说明当时是按年收藏甲骨。学者们还指

出，龟版尾部有孔，孔稍上部位有“册六”、“编六”之类符号，这是“贯韦编册”的证明。^①这种按年保存、编连成册的档案，都是未经史学家整理的文献，虽然具有编年典册形式，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史籍。

甲骨文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它的形成必须是文字、历法、史官三者同时存在，缺一不可。没有文字就没有一切形式的书籍、文献档案；没有历法，就不能推算时间、确定事件发生的岁时年月日，也就没有编年体的产生；没有史官，就不可能产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。甲骨文献的出现，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：商代文献已经具备编年体的三个基本要素。

甲骨文中的历法是商代通行历法。这个历法较夏代历法进步。中国最早的历法产生于夏代，战国时流行的《夏小正》一书，基本上反映了夏代历法。当然，人们根据日月运行规律、月盈月亏的周期，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、一个月分为二十九天或三十天，并以此安排农业生产^②，可以远溯原始社会末期，到夏代更加精确完备，历法不仅用于生产，而且用于记事。《诗经》中的诗歌多用夏历，《竹书纪年》也使用夏历记年，说明夏历已经相当成熟。所以，孔子曾主张“行夏之时”。^③甲骨文中使用的历法比夏历更

① 贯韦编册：韦即熟牛皮。贯韦编册就是用熟牛皮条把龟版、竹条编联起来，使之成册。这里指的是编联龟版。

② 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系统地记载十二个月的农业生产活动。

③ 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加精确，其中不仅有十二个月的名称，而且还有十三月的字样，说明商朝人已经懂得闰月的有关知识，也说明当时的天文和数学已经取得很大成就。这些历法知识为按时记事提供了可靠根据，可以说，没有历法就不可能有编年记事方法。因此，我们把历法视为编年体的第二大要素。

史官记事制度促成了编年体的萌芽。关于史官记载，已屡见于文献。据说黄帝的史官仓颉，据鸟兽足迹，初造文字。^①大挠作甲子，隶首作算数，容成造历。^②这三人也是黄帝的史官。这些记载显然是传说性质，是靠不住的。一般说来，史官制度建立于国家产生以后，不可能出现于原始社会。《吕氏春秋》除记载夏桀的史官终古之外，还记载了商代末年纣王的史官向挚，他看到纣王穷奢极欲、暴虐荒淫、不可救药，便装载了他保管的文书典册，逃亡到周族。这应当是可信的。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典籍都有大量关于商周史官记载，基本上是靠得住的。《周礼》中有关史官名称就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等等。这些都可以从实物中得到印证，甲骨文中有史字，有作册、太史、内史、尹等史官职称的记载，西周金文中，也有作册、内史、作册内史、内史尹等称呼，这些与文献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。

甲骨文中还有一个“史”字，其结构也可以证明史官是

①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·序》。

② 《世本·作篇》。